



张维迎：中国为什么特别需要企业家创新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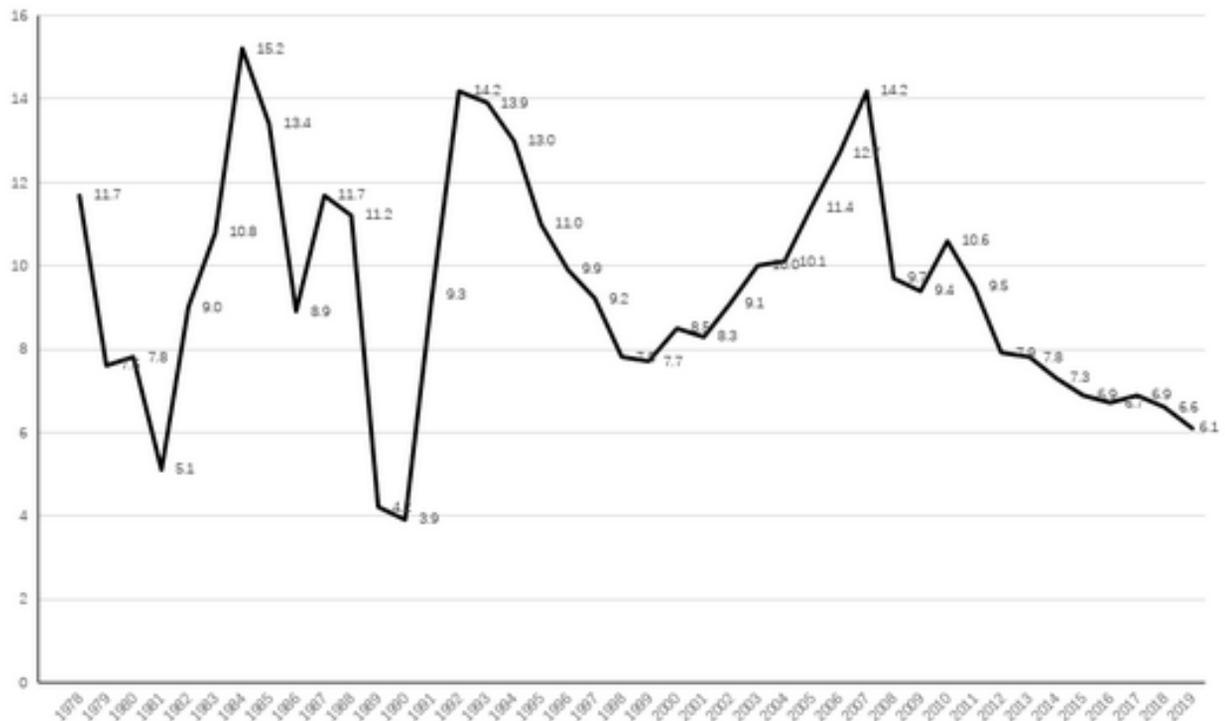


文/张维迎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）



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需要看一看过去 40 年的经济增长。我们会发现，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有很大的波动性，有高达 15% 的增长年份，也有不到 4% 的增长年份。经济增速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经历了 7 年持续走低，而在最近 10 年再次出现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大。

中国GDP实际增长率 (1978-2019)



我个人的观点是，很大程度上，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一个趋势性问题。

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趋势性的？

为什么是“趋势”而非“周期”呢？影响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，尤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。而技术和创新、体制和文化、人口和劳动力则是形成经济发展趋势的底层因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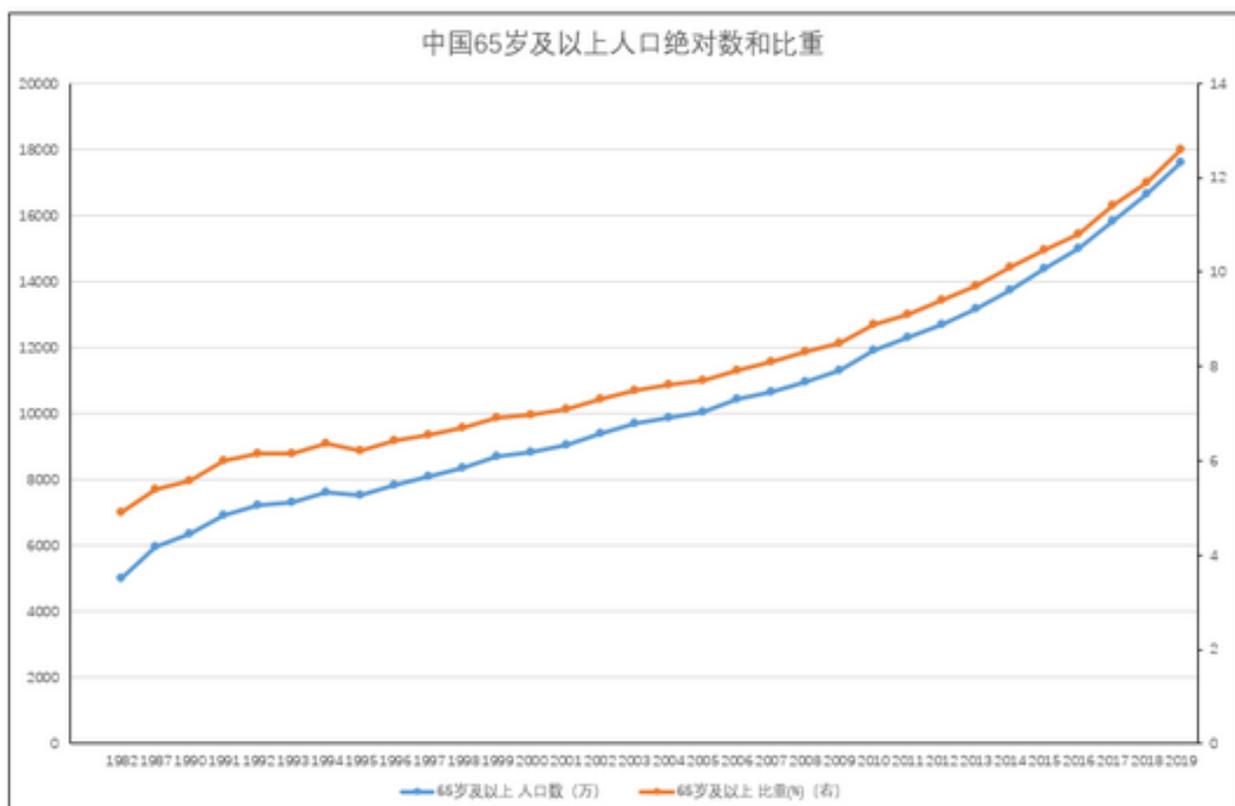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，技术和创新。就生产技术而言，我们过去 40 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西方国家 300 年来的技术创新而非中国自我创新的基础之上。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我国改革开放期间，西方国家三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大部分技术，都没有专利了，都可以为我所用，不需要花什么成本，

可以说是“免费的午餐”。2018年我写过《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》一文。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，大都同时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果实。但当我们把“低垂的果实”差不多采摘完了的时候，高处的果实不容易够着，我们的发展优势自然会递减。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套利实现9%的经济增长并不难，但发达国家通过创新想达到3%都非常困难。因此，如何实现更多的技术创新，是我们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。第二，体制和文化。我们之所以能利用别人的成果，是因为从1978年开始，我们走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，激发出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。

我们的体制改革是动态的，既有内部观念和政策变化产生的推动，也是与国际环境互动的结果。但无论内部观念还是外部环境，都在发生变化，波动、迂回时有发生，因此很难期待在开放和自由程度上保持直线递进式的发展。但体制与文化的开放程度、自由程度、权利保护程度，对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和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。一方面，内循环接替全球化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，这与突如其来的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有关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说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我们国内的变化相关，但无论如何，这已经是现实的变化，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产品要走出去会越来越难，中国经济要依靠更多的创新来维持增长越来越重要，但正如前面所说，创新并不容易。另一方面与我们自身的改革不足有关。改革开放之前，我们在体制上有很多限制，改革开放的核心是“放”，给企业家和人们更多的自由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。上世纪80年代，私营企业不合法，必须戴上集体企业

的“红帽子”才能生存，但企业家预期“红帽子”终将会摘掉，所以他们还是敢冒险的。但法治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，现在甚至偶尔还不时冒出重新公私合营的声音，这些都会影响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，尤其是持续投资的信心，而创新特别需要持续的投资。体制改革趋缓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，很难说清其中的因果关系。2003年非典催生了很多的国际间友好援助与合作，但这次新冠疫情却没能能够让国与国之间更加友好，反而激起了更多的误解和对抗，这非常令人遗憾，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。

第三，人口和劳动力。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帮助我们的人口数量降了下来，但同时也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。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，我们是人为制造了非常快速的人口老龄化，就像为了减轻体重把大腿锯掉一样。



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上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自改革开放到 2000 年前几乎没有变化,但在过去 20 年却急剧上升。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在 15 年前是中国的 22 倍,10 年前是 10 倍,5 年前变成了 5 倍,而现在只有 4 倍。2015 年之后,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泰国、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比我国更有优势,这导致中国在国际制造业市场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。



预览已结束,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: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0184

